

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的大规模战役——

## 川陕苏区反“六路围攻”

■薛闻兴 史绍华

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，红四方面军投入40多个团8万余兵力，历经10个月浴血奋战，以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，粉碎四川军阀140多个团的“六路围攻”，共毙伤敌6万余人、俘敌2万余人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。

**分析利弊，坚定信心。**1933年10月，蒋介石任命在军阀混战中“脱颖而出”的刘湘为四川“剿匪”总司令。此时，国民党中央军正在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“围剿”，为解除西顾之忧，蒋介石一面派人游说四川各路军阀联合起来围攻红军，一面为刘湘提供大批军费和武器支援。在蒋介石的支持下，刘湘踌躇满志，以其所属第21军为主力，纠集四川大小军阀组成六路围攻军，计划采取分进合击、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的策略，配合实施骚扰破坏、经济封锁等措施，企图在3个月内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陕边区。

面对敌强我弱和敌军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各方面全面围堵的不利态势，红四方面军冷静分析战场形势：川军内部派系林立、貌合神离，各路军阀均以保存自身实力为首要目标；陕军孙蔚如部已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，红军无后顾之忧；经过此前多次作战的胜利，红军在人力、物力上得到较大补充，更积累了丰富的对川军作战经验；同时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与巩固建设，也能为红军作战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。基于这些有利条件，红四方面军确立了“以我之长、击敌之短，立足长期斗争而最终战胜强敌”的作战指导思想，不仅统一了方面军全体官兵的思想认识，更坚定了大家制敌必胜的信心。

**初挫敌威，总结经验。**11月1日，川军第5、第6路围攻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开县以西地区突然遭遇。经5日激战，红军歼敌5000余人，但因兵力分散，未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，且敌军后援不断增加，红军处境十分不利。在此情况下，红军被迫转入防御，到中旬撤至南坝场、宣汉、达县一线与敌对峙。

11月16日，刘湘下令各路军发起总攻。其中，第4路的第3、第5、第6混成旅于11月23日侵占营山后继续北犯。26日，在该区域防守的红军第9军集中兵力实施反击，一举击溃敌第3混成旅，直逼至营山下，有力遏制敌人的攻势，为红军完成反攻准备争取了时间。

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召开会议，充分借鉴前期反三路围攻经验，决定继续采取“收紧阵地、诱敌深入”的方针，决心以第4军全部、第9军和第30军各2个师及第33军共20多个团编成东线部队，以第31军大部、第30军第90师、第9军第27



位于四川省万源市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。 资料照片

师共10多个团组成西线部队，通过节节抗击消耗、疲惫敌军，创造反攻破敌的有利时机。随后，红四方面军紧急展开政治动员、火线练兵、发动群众等各项准备工作，全军上下吹响“提高本领、消灭刘湘”的战斗口号，全力备战迎敌。

**两线配合，节节抗击。**至12月上旬，参与六路围攻的川军各路部队已全部出动。16日，东线敌第5、第6路在飞机掩护下，以乘船渡河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强渡前河、州河。早有准备的红军第4军、第9军设伏部队，趁敌半渡之际发起猛烈攻击，歼敌3000余人。17日至18日，红军东线部队在采取脱离接触、后撤收缩的转移过程中，抓住有利战机击落敌机1架。12月下旬至1934年1月中旬，红军东线部队灵活运用精兵强阻阻击迟滞、待敌近前突然打击、乘敌气衰反击、白刃拼杀歼敌、夜战袭扰乱敌、渗透摸哨俘敌等多种战法，成功挫败敌军多路进攻。

与此同时，担负钳制任务的红军西线部队在赤卫队和根据地区群众的配合下，采取阻击迟滞、突然反击、佯动助战等方式，有力阻击、迟滞并大量消耗敌多路围攻部队。战至1934年1月中旬，红军东、西两线共歼敌1万余人，还平息了万源城附近、罗文坝南北地区的反革命叛乱，消灭地方地主武装2000余人。敌人原本计划1个月完成的第一期总攻，在红军的顽强阻击下彻底落空。

**慎控攻势，主动反击。**为实现诱敌深入、寻机反击的作战目的，自1月下旬起，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坚守阵地与后撤收缩相结合的方式抗敌诱敌。19日，红军在万源城附近，以纵深穿插、分割包围的战术，主动发起反攻，歼敌3000余人，成功挫败了敌军的攻势。24日，红军抓住第5路敌军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，依托马渡关地区地势险要的地形条件，针对敌求胜心切、急于夺卒的心理，以凭险据守、秘密穿插、前后夹击等战术手段，成功挫败了敌军的攻势。

随着战线不断拉长、围攻时间持续迁延，各路敌军相继出现补给匮乏、士气低落、推进受阻的疲沓态势。加之临近春节，围攻敌军被迫“休整待战”。2月10日至14日，红军集中3个师的兵力，采取急进突袭、迂回穿插、乘胜直插等战法，对第5路敌军发起马鞍山、毛坝场等反击作战行动。虽未能完全突破敌阵地，但给敌军以猛烈痛击和强烈震慑，彻底击碎了其3个月“全部肃清”川陕边区红军的妄想。

**攻防相济，破敌总攻。**3月4日，敌军按照第二期作战计划再次发起总攻。在红军西线部队的节节抗击和顽强阻击下，第1至第4路敌军付出惨重代价，才得以缓慢推进。东线之敌采取“重点进攻”战术，企图以单点楔入突破的方式向苏区腹地推进。但在红军东线部队昼夜攻防的顽强防御与坚决反击下，第5、第6路敌军始终停滞不前。

4月3日至28日，敌军在第三期总攻的驱使下，妄图以东西并进、相向合围的战术围歼红军主力。红军充分利用敌军向前运动、孤立冒进、立足不稳等有利时机，主动发起伏击、袭击，极大消耗了敌有生力量，敌第三期总攻宣告破产。6月22日，围攻之敌集中50多个团兵力，以东线为重点发起第四期总攻。6月26日至28日，红军顽强坚守分水岭阵地，给进攻之敌以迎头痛击，并适时转入反击，兵分多路冲入敌阵，成功阻敌于阵地前沿，使其寸步难进。

**保卫万源，消灭我长。**7月11日，敌人开始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猛攻，妄图完成第四期总攻计划。10多日，红军打退敌人3次大规模猛攻。

刘湘见连攻不克，焦灼万分，遂于8月初发布奖惩条例。6日至7日，万源围攻之敌倾尽全力再次发起猛攻。红军官兵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定

信念死守阵地，并以积极的阵前出击乘势追击，围攻之敌被迫退七八里地，损兵4000余人，最终陷入“智穷力竭”的境地。

万源保卫战中，红军官兵以顽强意志、旺盛斗志和勇猛作战歼敌1万余人。经此一役，围攻之敌损失惨重，物资补给吃紧、官兵士气低落、后方力量空虚，敌我作战力量此消彼长，意味着红四方面军反攻的有利战机已经到来。

**强势反攻，迂回破敌。**8月9日夜，红四方面军以东线为主要反击方向，以青龙观作为东线反攻突破口，以素有“夜摸常胜军”之称的第31军第93师第274团为先锋展开反攻作战。经一夜激战，第274团歼灭青龙观大部守敌，占领青龙观全部要隘。紧接着，红军另2个营也攻上主峰，歼灭敌军大部。自此，敌军防线被打开一个缺口。

10日至17日，第31军第93师在两翼第9、第4军的配合下，充分利用青龙观突破口向敌纵深直插。至8月24日，红军东线反攻结束，刘湘主力3个师元气大伤。西线敌军见东线围攻主力全线崩溃，赶忙重新调整防线，企图依托通江两岸山地抵御红军反攻。8月下旬，红军除一部牵制东线刘湘部外，主力迅速西进渡过通江，乘夜从得胜山附近一举突破第3、第4路敌军防线。9月2日至15日，红军采取夜袭突破、穿插迂回、疾进猛攻等战术手段，相继突破第2、第3路敌军接合部，并昼夜兼程直插第1、第2路敌军后方，围歼西军之敌第2路1万余人，取得了反攻以来最大胜利。至9月下旬，川军大部溃逃至嘉陵江以西、营山、渠县等地区，红军乘势展开追击，先后收复北起广元、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，刘湘大肆吹嘘的“六路围攻”全部破产。

此次战役中，红四方面军始终保持对“敌强我劣”态势的清醒认知，坚定贯彻“收紧阵地、诱敌深入”积极防御作战方针，以灵活的战役战术，既高效保存了自身实力，又通过小规模战斗歼敌不断消耗敌有生力量、削弱敌进攻势头、震慑敌兵心士气；然后抓住敌消我长的有利时机，审慎选择反攻时机，以马鞍山、分水岭等反击行动狠打痛击，以纵深穿插、分割包围的全线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，实现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统一。同时，红四方面军采取边战边训的方式，全面开展运用性射击、攻防战术演练等针对性战场练兵活动，巩固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。

## 史说新语



红军“割麦证”。 资料照片

话。途经苗族、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时，红军露宿村外、不人民宅，买卖公平、损物必赔，将民族政策与群众纪律熔铸为一体。

岁月流转，精神永恒。一块作为粮秣凭证的木牌，不仅是红军对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，更是人民军队铁纪铸魂、初心如磐的见证。正是靠着这枚毫无私心的铁律，红军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与拥护，更在万里长征的漫漫征途上，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下，以纪律立信、以初心聚力，凝聚起跨越万水千山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伟力。

## 链接历史



烽火中的红色报刊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日军大举进攻山东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军不战而逃，山东大部地区迅速沦陷。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各地发动武装起义，开展抗日斗争。为传播党的抗日主张、巩固敌后舆论阵地、动员广大军民奋起抗战，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创办全省性抗日机关报。1938年12月，中共山东省委几经调整后改组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，随即着手落实这一决策。1939年1月1日，《大众日报》在沂蒙山深处正式创刊。创刊之初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即明确了其办报的根本原则：一是坚持党的立场，二是有利于统一战线，三是广泛发动群众。《大众日报》创刊词中也明确宣告“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，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！”

此后，《大众日报》迅速投身抗战宣传一线，全面开展敌后宣传工作，广泛发动根据地军民投身抗日斗争。尽管在抗战烽火中，报社多次遭遇“扫荡”，先后辗转多地，条件极端艰苦，但在党的领导下，报纸始终坚持出版发行，影响力持续扩大，很快赢得军民的信赖与拥护。1940年《大众日报》创刊一周年之际，毛泽东同志为报社题词，号召动员报纸等一切可能力量，“以提高民族觉悟，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，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，坚持抗战到底”。这一题词不仅为《大众日报》的发展指明方向，更为整个山东敌后抗日斗争注入强大精神动力。

1942年，为贯彻全党整风精神，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，中央宣传部发出“为改造党报的通知”。《大众日报》迅速响应号召，进一步明确自身“全省性报纸、分局机关报”的性质和定位，践行“党的立场，群众的报纸”的办报宗旨，在抗战烽火中继续奋勇前行。截至1949年4月1日奉命由解放区农村迁入济南，《大众日报》在长达十年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从未停刊，累计连续出版2510期，创造了中国革命新闻史上的罕见成就。

办报过程中，《大众日报》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紧紧团结群众、依靠群众，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，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将分散的民众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抗日合力。

打破政策传播的“语言壁垒”，打通与群众的联系。确保党的大政方针群众看得懂、听得进。1942年6月，《大众日报》刊发《减租减息问答》，把“二五减租”算成庄稼账：“地主得四成五，佃户得五成五，这是对的。”条文变成了庄稼话，群众才谈得上真正参与。针对根据地群众普遍识字率低的现实难题，报社还持续完善基层传播体系，让识字不多的乡亲也能“听”得进报、“说”得出话。早在1940年，报社就成立读者会，组织读报活动；改造后进一步制度化，结合冬学、识字班、民兵夜校，做到“只要有群众组织，就有读报组”。一人读、众人听，党的政策和战讯在拉家常中传开。读报组解决的是“入耳”，通讯员队伍解决的是“开口”。

1943年，报社明确提出“群众写、写群众”的办报方针，大力加强基层通讯员网络建设，推动群众用亲身经历讲述抗战。编辑黄秀珍深入沂南县岸堤区，从冬学和妇女识字班中发掘培养骨干力量，两年多时间就发展了近200名农民通讯员。这些“一手拿锄头，一手拿笔杆”的农民通讯员，把田间地头的生活、减租减息的亲身经历、支援前线的感人故事原汁原味地搬上党报版面。

把报道焦点对准群众切身利益，赢得群众的信赖。《大众日报》在报道内容上始终紧扣群众切身利益，始终把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，视作根据地不能不站稳脚跟、抗日斗争不能不坚持下去的关键所在，以大量篇幅持续聚焦减租减息、大生产和参军动员三大工作。在“双减”运动中，报纸连续刊发《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》《减租减息，增加工资》等系列社论，深入解读政策内涵，报道各地实践成效，推动经验交流与政策落地。在生产建设中，报纸不仅发表《开展春耕运动》等指导性文章，传播备荒增产经验，还



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云头峪村的大众日报创刊地印刷所旧址。 资料照片

## 以纸为媒，凝聚军民抗战合力

《大众日报》

■毕鑫明 张育豪 杨润鑫

通过专讯报道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帮助群众春耕等生动事例，激发军民生产热情。面对灾荒，报纸迅速响应，刊发相关报道和宣传画，发动社会各界赈济灾民，同时发表社论《粉碎敌伪残酷烧杀的毒计》，严厉控诉敌伪暴行；在医疗卫生方面，亦通过《日照召开医救会讨论防疫》等报道，传递对群众健康的高度关切。

把军民故事写出来、传开去，激发斗志，凝聚抗战的合力。报纸的笔锋始终聚焦群众，倾力讲述军民相拥、同心御敌的抗战故事。每逢重大战斗胜利，《大众日报》都会及时刊发捷报和社论，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。1940年6月，报道泰山区军民同心击退日寇的战斗事迹；1941年沂蒙反“扫荡”期间，报社随军印发号外，战士们阅后群情激愤，高呼“为牺牲战友报仇”。1942年12月，报纸刊发《重庆工人捐款慰问八路军》《太行民众修筑筑坑伤病员御寒》等多条消息，让前线将士真切感受到全国人民的牵挂与支持。在生产与劳模报道中，报纸既刊登指导生产的实用文章，又大力宣传董力生等劳动英雄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先进事迹。在参军动员方面，报纸刊登母亲送儿、妻子送郎的真人真事，让“保家卫国”从抽象的口号，变成了身边看得见、学得到的行动标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《大众日报》成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，名称与版式随时代发展不断调整，但“党的立场，群众的报纸”这一办报宗旨延续至今。回望抗战岁月，《大众日报》以通俗化表达和群众参与式办报，搭建起党群沟通的桥梁；以紧贴抗战中心工作的报道，为服务抗战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从根据地群众口中亲切的“咱们的大报”，到新时代齐鲁大地的主流党报，《大众日报》最宝贵的传统，正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、战斗在一起。

## 见证红军铁纪的“割麦证”

■邱帅磊 马忠达

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，珍藏着一块长约90厘米、宽约20厘米、厚约2厘米的木牌——这是当年红军筹粮时留给藏族同胞的“割麦证”。木牌纹理清晰，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，它虽没有经历战火硝烟，却以最朴素的方式，静静诉说着一段人民军队纪律如铁的往事。

1935年7月，红军从川西北高原黑水翻过打鼓山，抵达松潘以西的毛儿盖镇克藏村。此时正值青稞成熟的季节，可村庄里空无一人，田地里的庄稼也无人收割。原来，在红军到来之前，当地藏族同胞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蛊惑，误信红军“烧杀抢掠”的谣言，纷纷躲进深山。

当时，红军经过长途转战，粮草早已耗尽。战士们大多靠挖野菜、嚼草根甚至煮皮带充饥，饥饿与疲惫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。眼前这片成熟待收的青稞地，是维系红军生存的唯一希望，却也成了考验红军军纪的一道严峻关口。

危急关头，前敌总政治部迅速颁布筹粮纪律：非必要不收割群众粮食、优先征用土司头人粮食、收割群众粮食必须留下凭证、严禁损害未成熟作物。这一筹粮纪律，将“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”“买卖公平”“损坏东西要赔”的铁律，转化为可执行、可追溯、可兑现的刚性准则，是人民军队一系列纪律要求在绝境中的坚决践行。

军令既出，全军一体遵循。红军以

班排为单位统一收割青稞，每块田的收成都经过精细计量、逐田登记。每收割完一块田，战士们就会将前敌总政治部统一制作的木牌“割麦证”竖在田头，盼着群众归来后，能凭此兑换所需物资。

木牌上的字迹质朴庄重，承诺掷地有声：“我们在这块田内割了青稞××斤，我们自己吃了，这块木牌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。请你们归来以后，拿着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，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、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，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前需要好好保存这块牌子。前敌总政治部，麦田第×××号”。珍藏在这红军长征纪念馆中的这块木牌上，“二百斤”3个字颜色比其他字迹更深——由于当时红军缺乏精准计量工具，便特意留下空白，待当地群众归来后，可根据往年收成估算粮食数量自行填写。

整个过程中，没有少计漏登，更没有强取豪夺。各级纪律检查队巡回督查，逐田核对收割数量与牌文内容，确保每一笔都分毫不差，用行动守住了秋毫无犯的军纪底线。

数日后，当地群众返回家园，只见村寨安然无恙，田亩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每块麦田旁都立着木牌。红军依旧风餐露宿，不敢惊扰百姓生活。眼前的一切让群众深受触动，他们终于意识到，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截然不同，心中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由于当地群众多为少数民族，大多不识汉字，红军留下的很多“割麦证”没能发挥兑换作用——有的被当作柴火烧掉，有的被用来修补房屋、充当粮仓盖板，如今纪念馆珍藏的这块木牌，正是因被用作盖板才留存下来。

从一块块“割麦证”开始，在川西北高原辗转战斗的一年多时间里，红军各部队在藏、羌群众的支持下，共筹集粮食2000余万斤、牲畜20余万头，为顺利穿越草地、北上抗日奠定了物质基础，书写下“牦牛革命”的壮丽篇章。

彼时长征路上，类似的纪律坚守并非孤例。1934年长征出发之初，红军总政治部便在《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》中明确要求：“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……坚决与脱离群众、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”。1935年1月，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告知群众，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，是有严格群众纪律的军队，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，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，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，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。1935年5月，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，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以六言韵文明示全军：“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势如破竹；今已来到四川，尊重彝人风俗。军纪十分严明，不动一丝一粟；粮食公平购买，价钱交付十足”。部队严格遵守，遇害不开枪、受扰不反击，以绝对克制赢得彝族同胞信任，终成“彝海结盟”的历史佳